

自拍杆的创新意义何在

王晓松

在今天的热点与热词中,有一个与科技创新相关,那就是“自拍杆”。这个小小的、被赋予了“神器”称谓的小物件,在两会的图片报道和视频会议影像中层出不穷,确实吸足了大家的眼球。

追根溯源,自拍杆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但它真正风靡,却与自拍潮在这几年来的风生水起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影像数码化及其产品的大量普及,使得普通人的自我拍摄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则是社交媒体的应用使得人们自我展现欲望得到极大的鼓舞,自拍并将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广泛的分享成了一种被大众快速接受的时尚。

在这期间,新的自拍英文词汇“Selfie”也被创造出来,甚至被《牛津英语词典》评为“2013年度单词”。虽然大量的自拍充斥社交媒体,但是凭人手把持所拍出来的相片有一点美中不足,即往往都是大头照,甚至出现严重的变形。为了能把更多的景致纳入到自拍中来,自拍杆就应运而生,从最初的被限制运动爱好者小圈子,逐渐为大众所青睐。2014年,美国《时代》杂志还将之称之为“世界25大发明之一”,一度很有影响。

当然,自拍杆能够获得如此美誉,确实让很多人不解。这个可以伸缩的小金属杆,如果说其上的蓝色设备还能够称得上有些科技含量外,似乎还真找不出哪里还有什么“高、精、尖”的东西。但要看到,从美国总统到今天中国的普通百姓,使用自拍杆的热情却是实实在在的。就这几天,自拍杆在淘宝上的关注指数环比上升了近40%,是去年同期的近60倍,火爆程度还真不是其他产品所能比拟的。

自拍杆的火爆,源于它是一个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应时性创新,是同整个创新发展趋势相吻合的伟大创造。而这也正是理解创新

和从事创新者最需要把握的基本规律。从自拍杆的实际使用看,它既弥补了自拍的不足,又给数码产品和社交网络提供了进一步创新的机会。比如,大家很容易就想到的是,架在自拍杆上的数码产品在图像显示尺寸与功能上肯定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以适应人们使用自拍杆的更多需求;而通讯传输方式也存在看如何更加便利等改进的空间。这些都会潜在地催生出生更多的创新产品。可以说,除了自拍杆本身之外,其背后同样是商机无限。

此外,自拍杆也具有社会意义。还是以这次两会为例,有了这个小小的自拍杆,一个记者加上一部手机,实际上就可以承担起以往需要配备专业摄影设备、大型转播车以及大批专业人员一起才能完成的现场报道与转播工作。仅从这一点上看,自拍杆的意义还不小吗?而跳出两会之外来看,自拍杆能够让

人们把更好地表现自我的自拍变得更加优美、更加传神,这实际上也有利于张扬人们的自我满足感,进而激发起人们的自信。

有人认为,自拍发展下去是一种病态,这无可厚非。但是,从自拍杆能够更真实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变形地来反映自我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自拍杆反倒有助于纠正人们的自我变形心态,促进人们对真实自我的回归呢?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自拍杆的意义,可能就不单单是在科技创新领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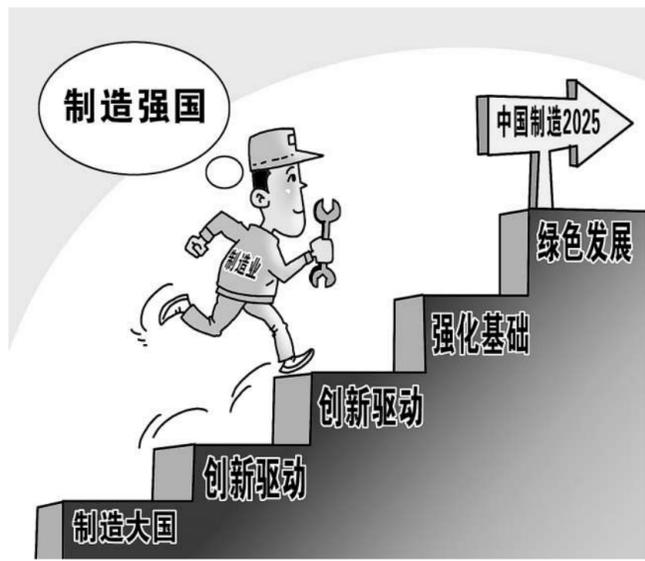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思考,小小的自拍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工具而已,其创新的意义与价值值得认真对待。正如人类的出现和石头的一小下打磨磨不可分一样,历史上伟大的进程往往发端于青萍之末。对小创新的大把握,是创造伟大历史的前提,何况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进程的路上。

缺乏攻坚克难的勇气,工作上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产业要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要靠广大干部率先作为。如果官员慢作为、不作为,就会贻误发展的好时机,长期下去就会让中国经济增速甚至失速,这样的代价我们承受不起。种种迹象表明,“为官不为”已经成为一种风险。

身在岗位就该有作为,这既是依法履职的要求,也符合反腐倡廉的规定。对于“为官不为”,问责是必须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开出了“药方”——一是完善考评机制;二是监督问责。“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为官不为”该该醒了。



代表委员热议打造“中国制造”升级版

图片来源:CFP

“为官不为”危及发展

郭振纲

3月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参加四川团审议预算报告时再次批评“为官不为”现象,他举例说,去年还有1万多亿元的资金存量没有用,一些地方给了钱、批了项目、供应了土地却没有用,就是因为不作为。

“经济换挡,爬坡过坎更需要改革快马加鞭,如果干部为官不为,不仅不利于党风政风,甚至影响、破坏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的全局”,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硕说。

在经济“新常态”和反腐风暴的双重高压下,一些地方的干部出现等待、观望情绪,庸政、懒政、怠政等现象抬头蔓延。“新常态”下

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担当与作为,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议题。

“为官不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两会期间,成为全国两会热议话题。

对于“为官不为”,李克强总理此前曾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既当前又惠长远的政策措施,启动了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有效但还不够理想。

去年投资完成率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利用率只有50%左右。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争项目、拉投资不惜代价,甚至“跑部钱进”,而

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常态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新常态下的“为官不为”,突出的表现有两个:一是有些干部拖拖拉拉,对新常态认识不足。新常态不惟GDP,一些地方和干部就开始走极端,认为既然不考核GDP,工作积极性就下降了。从原来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二是对引领新常态的工作能力跟不上,如何在新常态下尽责履职,不少官员的能力存在脱节。遇到矛盾就绕,遇到问题就躲,

等核心理念的解读也缺乏鲜活的时代感,不能与时俱进。应该说,今天的国人学习传统文化,是为了在现代社会活得更美好——传统文化的滋养会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和谐,更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出正确的选择,活得从容、幸福。

矫正误区的好做法就是认真、全面地学习。姜昆建议将传统文化列入中小学必修课,通过系统地学习,人们就会逐渐克服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认识,还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

把握了“本来面目”之后,我们还要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即让传统中的精髓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实现“无缝对接”。倘能做到这一步,传统文化必然得以真正复兴,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及整体的精神风貌亦会焕然一新。

“医闹”的法律之殇

段梅红

去年两会期间,医卫界90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防止医闹“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今年两会上,提案牵头人凌锋透露,公安部已出面主持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医闹事件的预防处理将有望纳入法制调控之下,因此有媒体报道:“医闹”有治了!

近些年“医闹”猖獗,医护人员屡屡被伤害。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相关法律不完善。

根据我国刑法第291条规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公共场所”不含医院。所以,医闹聚众闹事,只要不伤死人、没对医护人员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都不涉嫌犯罪,也不会被刑事处罚,顶多是行政处罚,闹事者毫无震慑,实为法律之殇。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意义重大。

用法律手段严惩医闹,不仅是医卫界的心声,也是社会各界的意愿,因为它不仅是保护医护人员安全,也是维护患者的就医环境。走笔至此,想起了一起伤医案。这位伤医者不是医闹,而这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也与法律之殇有关。

情急之下酿下血案。

在妻子眼中,王宝洁是个“好好先生”,她认为,丈夫的撒刀之举是诉讼3年无果反遭“无限期休庭”后采取的“极端行为”。其实,这起纠纷一开始找的是医学会,走不通,又走司法鉴定程序。走不通是因为原告被告双方提交的病历不一致,司法鉴定停滞了。目前我国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有三条途径:向医院相关部门投诉,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医患诉讼的核心就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按相关规定,医患纠纷案件需要出具的医疗鉴定,从程序和时间上都不是患者所能把握的。

如果鉴定问题解决不了,官司可能就遥遥无期了。而“拖”是最能折磨人的,“拖”会改变人的心性,会改变人对事物判断的初衷,会使“希望”变成“绝望”,因此许多人感慨“伤得起,拖不起”。

对于医闹,严惩是必须的,但毕竟是在“闹”了之后,如果不让“闹”发生,那才是最好的结果。所以,医卫界的“紧急提案”四字前还有“防止”二字。

虽然产生医闹的原因很多,但现有调处机制的低效能和作用有限的情况说明,建立新的能被医患双方接受认可的解决途径已刻不容缓!笔者注意到,很多地方也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只有解除医患双方的法律之殇才能创造一个快捷有效而又富于人文精神的环境,才能既利于医护也利于患者,才能使医患合力面对共同的敌人——疾病!

还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

郑连根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姜昆建议在小学阶段替代传统文化课程设为必修课,用传统文化课程替代现有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正如姜昆所言,《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有诸多不足,内容有些在语文、历史、科学等科目中已有出现,流于空泛,特色不明显;课程也多停留在日常行为规范、初步社会认知等基本层面上,没有上升到人格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这一战略高度,此种情况确实需要改变。

与“品”课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拥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其思想深度和文化广度都足以统摄“品”课内容。如果教材得当,

教法得当,中小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效果肯定要优于“品”课。

最关键的是,若将传统文化列入中小学必修课,可能会激活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系统,矫正当下“国学热”中的种种误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要很好地完成这种转型,我们确实需要全面继承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过去,我们曾以“破四旧”的名义,不加区分地摒弃甚至诋毁过传统文化。这种做法是粗率的,不可取的。对此,人们现在已经有了较理性的认识,开始提倡学习传统文化。

但是,曾经的破坏对今人学习传统文化确实构成了某种隔阂与障碍。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学校和家长认为让孩子背诵《弟子规》、古诗词就是国学了;提倡孝道,就让孩子给妈妈洗脚。不是说《弟子规》不好,也不是说小学生给妈妈洗脚不对,而是说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活得更美好——传统文化的滋养会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和谐,更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出正确的选择,活得从容、幸福。

矫正误区的好做法就是认真、全面地学习。姜昆建议将传统文化列入中小学必修课,通过系统地学习,人们就会逐渐克服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认识,还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

把握了“本来面目”之后,我们还要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即让传统中的精髓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实现“无缝对接”。倘能做到这一步,传统文化必然得以真正复兴,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及整体的精神风貌亦会焕然一新。

表示,“不断提高核安全性和不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是赢得公众接受和认可的重要基础”。

在3月3日“走进中核集团‘华龙一号’”媒体座谈会上,刘巍介绍,中国核电发展30多年,“没有因为事故死过一个人”;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对“华龙一号”如数家珍:从反应堆、燃料元件到辅助系统,从设计、建造到运营,完全不依靠国外,国际原子能机构审核评定符合当今世界最严格的安全标准。

而“华龙一号”总设计师、中核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邢继则用国际标准分析方法推演,“华龙一号”的事故概率为10⁻⁷,“比坐飞机出事的概率还要低”。

“公众对核电站的安全顾虑可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建设新核电站之前都会请老百姓到已建成核电站亲自看一看的原因”。全国政协委员、中核建总经理王寿君说,只要经过科学的认识,就会了解,核电站是非常安全的。“事实上已经建成的核电站,周边老百姓都非常支持,他们是核电站的最大受益者!”

面对重启后的新一轮核电建设,王寿君表示“早就做好准备!”他介绍,现已拥有可以同时建设40个反应堆的能力,核电站可以增加,绝对可以保证国内核电发展和核电“走出去”的需求。

(科技日报北京3月10日电)

中国核电今天按下重启键

(上接第一版)

“经过这样一个严肃慎重的决策过程,如今,无论核电站的研发、设计、建设,还是验收和运营,都更加安全了,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安全发展核电’,我认为更有保证了!”王炳华说。

算账:核电填补化石能源的巨大缺口

目前,中国在运核电机组22台,总装机容量2010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规模2800万千瓦。

全国政协委员、中广核董事长贺禹算了一笔账:按照去年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承诺的“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到20%”来计算,届时非化石能源供应要达到12亿吨标准煤,在考虑最大发展潜力情况下,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折合标准煤8.7亿吨,剩余3.3亿吨的缺口需要由核电填补。

“由此测算,核装机规模需要达到1.5亿至2亿千瓦”。贺禹进一步分析,如果同时参照《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核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

上”的规划,核电将面临1.1—1.6亿千瓦的硬性提升空间。

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核电供给占总发电量比例只有2.1%,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2014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核电站最多的国家,拥有104座,核电占总发电量的19%。法国电力则主要依赖核能,比例高达76%。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少数拥有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具备大规模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其中就包括确保建设运营高安全性核电站的能力。《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承诺可靠、可信。

“通过近八年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核电自主化实践,中国已基本掌握了三代核电研发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技术,正在实现先进核电技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突破和跨越”。王炳华透露,南非、土耳其、英国、巴西等都对CAP1400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

2014年11月,国核技会同美国西屋公司与土耳其启动建设2台AP1000+2台CAP1400机组的排他性协议谈判。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联手推出的“华龙一号”也在今年春节前夕成功出口阿根廷,成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关键一步”。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巍用一句核工业界流行的话来说比喻中国与国外的核电合作:“你进谁谁的核电,就与谁谁那个国家结了婚,而且是百年婚姻”;王炳华更是以“大国技术,强国技术”来定核电技术。在AP1000和CAP1400走出去过程中,作为AP1000技术原创方的美国西屋公司主动找国核技商量:我们是战略合作,一起开拓第三国市场?还是以竞争的姿态出现在第三国市场?——“这说明我们的技术已与美国并驾齐驱!”

“在世界范围内,核安全及其公众接受度”深刻影响着核电业持续健康发展,这两点相互依存”。法国电力公司亚太区副总裁普罗内在“2014年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暨第四届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上

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阵建设方案确定

(上接第一版)

SKA1建造费用共计6.5亿欧元。它由两套世界领先的望远镜设备构成,位于南非的约200面抛物面天线组成的蝶形天线阵,以及位于澳大利亚的由超过10万个偶极天线(类似于家用电视天线)组成的低频孔径阵列。

SKA总干事Philip Diamond表示, SKA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宇宙的认识,SKA将比目前的任何任何设备都要先进许多倍。

“这两套互补望远镜将使我们得以开展一系列激动人心的科学研究,例如,通过观测脉冲星和黑洞来探测爱因斯坦所预言的引力

波、检验万有引力理论及搜寻地外生命的蛛丝马迹”,SKA科学主任Robert Braun说,“我们将用SKA去观测宇宙演化史上一块从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宇宙黑暗时代。这是宇宙大爆炸后的头10亿年,在这一时期,宇宙最早的恒星和星系正在形成。”

分析师李国琦认为,2015年将是智能硬件领域快速发展的一年,可穿戴设备将在电子消费行业掀起一个新的浪潮。“基于安卓系统的智能手表已经为智能可穿戴市场打下基础,Apple Watch的发布相当于注入了‘催化剂’。”

不过,苹果只能帮到这儿了。要想借智能穿戴的东风起飞,产品本身还是硬道理。李国琦说,让产品深得人心本身就是一项严峻的挑战。“深得人心,就得紧贴、甚至超越用户需求,但是用户需求时刻变化且难以预测。成功预判用户对智能手表的需求是一个价值连成的问题。”

歌仕推测,或许苹果此时也不知道有一款智能手表应该具体满足用户什么需求,所以才将主流功能全部堆了上去。“未来每个人身上可以有三四台电脑,身体的不同部位(带)着不同电脑,每部电脑的功能将更单一和明确。”她还不清楚未来的电脑究竟会呈现怎样的形态,但她确定,可穿戴市场的爆发点已经越来越接近,其前景“一定非常光明”。(科技日报北京3月10日电)

Apple Watch来了!

(上接第一版)和苹果之前的产品一样,Apple Watch天生就带着一种“个性”基因,透着浓浓科技范儿,其他厂家难以复制。

为可穿戴市场注入“催化剂”

虽然成功经验复制不来,但一些智能硬件厂商还是期待着苹果出手,期待其凭借强大的品牌号召力“教育”消费者。

歌仕指出,目前可穿戴设备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产品以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和智

能手环为主,同质化严重,与智能手机等移动端相比应用服务少,消费者认可度亟待提升。而苹果入局,可以发挥“教育”和“带动”作用,激活可穿戴设备的市场。“市场起来之后,会有更多资金进入,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期权的杀手级应用和产品。”

根据速途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5智能硬件市场分析报告》,2010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规模仅有0.9亿元,2014年市场规模猛增到66.2亿元。速途研究院数据

中国大飞机三剑客蓄势待发

(上接第一版)

他介绍,C919客机是我国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的重点型号之一。中航工业作为主供应商,在项目研制中承担了发动机、8大部分机体结构以及26个机载系统的研制工作;静力和试飞两项重大试验任务。此外还负责了大部分机体结构试验和其他相关试验工作。

唐军表示,目前C919各项任务正按照总体要求顺利推进。

世界最大在研水陆两栖飞机将于2016年首飞

“水陆两栖飞机AG600的研制再次提速。”唐军透露说,“从目前安排来看,将在年内完成总装,计划明年实现首飞。”

AG600是为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而增加的一款重大装备,也是目前世界上在研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唐军介绍,其起飞重量可达53.5吨,20秒内可一次汲水12吨,能满足我国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亦可根据需要加装必要设备,执行海洋环境监测、资源探测、客货运输等多种任务。他透露,今年2月14日,AG600机身大部件通过了适航审查制造符合性检查工作,成功获得机身大部件“批准放行证书/适航批准标签”,研制和适航审定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工作,研制工作再次提速。

(科技日报北京3月10日电)

分步推进城市公交电动化 助力雾霾治理

(上接第一版)

不过,纵然电动化有种种好处,若没有技术支撑,也难以落地。如果满大街都跑电动公交车,车辆供应跟不上,技术不够成熟?王志学表示,这些问题不用太过担心。实际上,在国家多年支持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电动汽车产业技术体系。“简单说,就是电动车,有;电池,有;成功案例,也有。”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一批“零排放”电动公交车24小时不间断穿梭在奥运村、媒体村等区域,把“绿色理念”装上车轮。

近年来,科技部开展了“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程,据不完全统计,从2009年到2012年底,共推广新能源汽车2.7万辆,其中纯电动客车近2000辆。2014年我国纯电动客车产量达到12900余辆,比上一年增长了6.54倍。”这说明我国纯电动客车产业在技术和产能方面具备基础。而且,若是推进城市公交电动化,还能进一步加快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推动我国汽车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王志学表示。

“不过城市公交电动化还面临着两方面问题,一是交车成本负担较大,二是运营和基础设施环节补贴不足。”王志学说,从纯电动公交车示范运营的实际情况来看,即使政府有补贴,公交车企业仍普遍反映成本较高,难以承受,使用纯电动车的积极性有限。现行对电动车的补贴也主要集中在前期购置

环节,缺乏运营和基础设施环节的补贴。比如电动车电池更换的钱谁来负担,就没有明确政策。电动车要想跑起来,还需要充换电设施,这部分投资也没有统一的扶持政策。王志学建议,除了设置给企业的运营补贴外,可以多管齐下减轻企业负担。他看到,深圳、贵阳和重庆等地公交系统已经开展了“车电交易”的尝试,将碳减排所得收入用于补贴公交企业发展。“如果公交‘碳交易’机制在全国范围推广,纯电动公交车‘零排放’的优势将充分发挥,碳减排收益也能补贴公交企业。”

至于公交车上路的配套设施建设,也不一定非得政府来唱“独角戏”——力负担,可以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吸引多种主体投资。像深圳采用“车电分离”模式,天津采用“PPP”模式,青岛采用电网主导建设模式等,王志学认为这些实践中的有益经验都可以借鉴。

采访最后,王志学还强调了技术和科研。“提高纯电动公交车使用经济性的根本在于通过技术进步降低车辆价格、降低单位里程电耗,降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价格。”他建议,进一步加大对纯电动公交车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强对电池等关键部件环节的支持,提高技术性能,降低成本。特别是加强对双源无轨客车、双源双充、快充等纯电动公交车领域新的技术路线的研发和推广,提高现阶段纯电动公交车的运营效率。

(科技日报北京3月10日电)